

泛海书院丛书

# 猜想与求证

——社会主义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世纪探索

江春泽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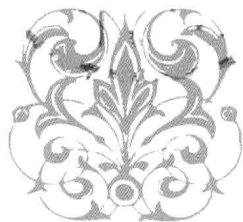
復旦大學出版社

泛海书院丛书

# 猜想与求证

——社会主义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世纪探索

江春泽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猜想与求证——社会主义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世纪探索/江春泽著.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 4  
(泛海书院丛书)  
ISBN 978-7-309-10364-9

I. 猜… II. 江… III. 社会主义社会-资源配置-研究-中国 IV. F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32093 号



猜想与求证——社会主义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世纪探索  
江春泽 著  
责任编辑/徐惠平 鲍雯妍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春秋印刷厂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19 字数 344 千  
2014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0364-9/F · 2015  
定价: 39.00 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前 言

## (一)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是作者关于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社会资源配置方式求解过程的总体反思。对于社会主义社会能不能以市场作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这个命题,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才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求解到科学的答案。本书实录了前苏联和中国在求解过程中的艰辛、曲折和为此付出的高昂代价,其中包含了作者亲历、亲知的一些故事以及作者自我思想解放的心路历程。在后记中,以“跨越封闭的藩篱”为题,真实地还原了作者在20世纪80年代赴美国和欧洲实地观察与思考的心得。全书生动地说明,只有以史为鉴,与时俱进,才能真正搞懂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科学的社会主义、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本书的研究是从1902年意大利新古典经济学家帕累托提出的“猜想”切入的。他于1902—1903年在《社会主义制度》中首次提出了由一个“社会主义的生产部”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命题。按照自然科学的惯例,凡是没有经过证明的命题都叫做“猜想”。所以,我把帕累托提出的命题也称为经济学的一个“猜想”。

自从这个“猜想”提出后,西方经济学界曾在理论上开展过持续很久的激烈论战,争论的焦点是用计划配置资源是否可行以及效率如何。十月革命以后,从列宁开始,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践中探求建设社会主义的途径时,优先考虑的资源配置方式是计划。此后,争论的焦点逐渐演化为社会主义国家能不能搞市场经济。列宁在十月革命前,曾经提出过“国家辛迪加”的计划配置社会资源的模式,但在十月革命后,他注意从实际出发,一步步地(局部地、点滴地)从“计划”退让、向“市场”靠近,他多次修正自己的认识、调整经

济体制。调整过程中有争论,但争论基本上是自由的、民主的,争论的过程是探索的过程,我把它称为“求证”的过程。到了斯大林时代,计划成了政治话语和法律制度,市场成了禁忌词汇,“求证”过程不再是纸上谈兵的笔墨官司,也不是决策过程中正常的民主讨论,而是充满了血腥的政治斗争。

斯大林逝世以后,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90年代初,尽管苏联关于经济改革的决定、法规等文献堆积如山,但都没有突破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没有破除“计划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等于资本主义”的理论误解和政治桎梏,没有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竞争性市场的作用。改革的动因只是从直观上把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归结为决策权力过分集中,由此,改革几乎都是从行政性分权入手。比如,1957年赫鲁晓夫时期改革的基本特点是把部门的行政分权改为地区行政分权,撤销了25个联盟中央级的部和113个加盟共和国级的部,改成105个经济行政区,把原来隶属于联盟和加盟共和国的企业下放给地方。中央管辖的工业产值由45%下降到6%。计划物资由中央平衡改为地方平衡、中央综合。结果并没有改变行政直接控制的弊端,反而因为打乱了原有的经济格局,加剧了地方主义,使经济出现混乱。从1965年开始了勃列日涅夫时期长达18年的改革,其特点是在不改变国家集中统一计划的原则下适当扩大企业权限,加强企业的物质刺激。两次改革的目标和主要措施都是以不触动传统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为前提。而且在改革过程中,理论上对所谓的“市场社会主义”开展不间断地批判。实践中,国家直接下达的指令性计划的产品达4000种,约占工农业总产值的80%—90%,95%以上的生产资料仍由国家统一调拨,83%的企业利润由国家直接或间接分配。在这样的外部条件下,要求企业实行“完全经济核算制”只是徒具形式,经济长期停滞不前。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尽管在政治上搞了很多开放,但在经济上对“市场经济”仍然讳莫如深,计划仍是资源配置的主要的、基础的方式。苏联搞了30多年的经济改革,尽管航天技术可算世界领先,但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日用消费品长期供应短缺,而且每况愈下。其总的经济效果是,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递减,直至1990年开创了战后经济负增长的先河,1991年又一月不如一月。季度统计公报的经济综合数字“令人目瞪口呆,没有一个光明点”。整个国民经济陷入严重混乱,失衡又失控。西方分析家当时估计,当年夏季中期,苏联经济可能完全瘫痪。在这种经济形势的背景下,人民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苏联的经济、民族、社会、政治四大危机全面爆发,交织发展,政不通,人不和,令不行,禁不止。整个社会几乎濒临“爆炸性的边缘”。民族纠纷与罢工浪潮波及全境。1990年4月20日,苏联总理帕夫洛夫在电视讲话中告诫:“现在面临的已经不是有人生活得好与有人生活得糟的问题,而是真正威胁到国家存亡的问题。”这就是实行了70年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苏联解体前夕的形势。当然,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长期实行僵化的排

斥市场经济的体制和经济效果不佳是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

除苏联外,在社会主义阵营里,南斯拉夫是第一个“吃螃蟹者”。1950年,它首先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决裂,实行了他们自己创新的“社会主义自治制度”,从而遭到了共产国际的集体大批判直至开除、断交。自治体制帮助南斯拉夫国家和人民渡过了最艰难的时刻,激发了人民的建设热情和奋斗精神,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曾经取得过不小的成就。遗憾的是,自治制度的理论是另一种形式的教条主义,并带有相当程度的空想成分。它虽然与中央计划体制南辕北辙,但现在回过头来总结,自治体制的着眼点仍然是把过度集中的权力分散给地方、生产单位和劳动者个人,而不是着眼于形成竞争性的全国统一市场。具体地说:

首先,它的产权制度更不明晰,依照原南共联盟领导人、理论权威爱德华·卡德尔关于“社会所有制”(自治体制的基础)的经典解释,它“既是人人的,又不是任何人的”,公有财产就更加典型地成了“没有主人”的财产;

其次,企业没有形成以经理为中心的经营决策和生产指挥系统,而是由本厂工人定期民主选举的工人委员会集体决策,常常错失市场提供的经营决策良机,而且微观操作的质量极不稳定,企业管理水平不平衡,这也有碍统一市场的形成;

再次,收入分配是在本工厂内由全体工人按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原则民主讨论,结果是相当数量的企业搞短期行为,长期没有积累,甚至是负积累,扩大再生产所需资金长期依赖贷款,企业收入基本上被吃光、分光;

最后,南斯拉夫曾经宣布“国家经济职能消亡”,企业之间以及企业和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之间的关系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是“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联合”,它们之间是通过“自治协议”和“社会契约”所协商的价格进行交换,且不说现实经济生活中如何扯皮和不兑现,更重要的是这种个别单位之间协商的价格并不是在竞争中形成的均衡价格。没有竞争机制就不能促进企业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刺激产品更新换代和技术进步。这实际上是从传统体制的极端跳入了更加空想的产品经济理想王国。此外,理论上还有很多有碍发展市场经济的条条框框,诸如“引进外资就是进口资本家”,对外开放只能借外债而不能直接引进外资,以致外债债台高筑却没有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与方法;“雇工不能超过8人”,也不能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形成竞争与合作;等等。

总之,原南斯拉夫一方面在宏观上宣布“国家经济职能消亡”,这就砍断了国家对经济生活干预的“有形之手”;另一方面又不明确通过改革来形成国内统一的竞争性市场,“无形之手”也没有发育起来。因此,这种既无计划又无市场的自治制度,虽然一度因分权而释放出一定的能量,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生机活力,但由于它没有形成有效配置资源的机制,进入1980年代以后便陷入长期滞涨的困境和危机而不能自拔。

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东欧国家中,发生过波匈事件,60年代发生过捷克事件,究其根源,都与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经济后果有关。此后,东欧一些国家开始了探求在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框架内与市场机制某种程度结合的种种做法,其中,效果比较好的当属匈牙利,它一度以过渡到“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新经济体制著称,且有“苏联阵营消费者天堂”的美誉,但随后又陷入困境而未能自拔,除各种内外环境因素外,从经济体制改革本身分析,是因为它进入了“间接行政控制的怪圈”,即企业虽被允许进入市场,但市场的一切信号和参数都是由中央计划决定的,难以形成竞争的机制。所以,匈牙利在90年代以前也没有发育出健全的市场体系。波兰当时的改革效果不明显,加上当局领导的一些错误决策,罢工频发。1980年从7月2日起,在波兰发生持续两个多月的罢工,波及波兰30多个大小城市和1000多个工厂,参加罢工的工人人数达60多万。8月底,在波兰当局做出重大让步、工人也降低了某些要求的情况下,双方谈判达成某些协议,大规模的罢工风潮才告平息。但问题并未解决,只不过从爆发的形式转成长期的不稳定。

中国的“求证”过程更加曲折复杂。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这个“求证”过程才逐步逼近实际。但即使在改革开放后的10多年里,对于计划经济为主抑或市场经济为主,仍然充满了反复曲折的争论,批判市场经济的浪潮仍不时泛起。只是到了90年代初,邓小平勇敢地对这个世纪难题给予了明确的回答,他一锤定音地说:“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我个人认为,正是这个答案才使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真正从空想成为科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与市场经济兼容了的社会主义,它的成就是当今世界的一大亮点,也是社会主义运动复兴的希望。

邓小平的答案对1902年帕累托提出的“猜想”是反证,那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仍然是市场,而帕累托的“猜想”——由“社会主义生产部”的计划来优化配置全社会资源是不可行的。实践中,大规模实验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效果虽然在某些时空也曾闪过光,比如在20世纪30年代与西方世界的大萧条对比,又比如在二战时期保证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但战后苏联仍坚持僵化的经济体制,拒绝市场经济,因而被西方世界第三次科技革命带动的生产力飞跃而远远地抛在了后面,最终的结果被证明它的资源是误配置,是低效的、不能持续下去的。邓小平的答案正是总结了长期实践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而得出的。

实践对帕累托猜想是“反证”。帕累托的辩护者们可能会说,苏联十月革命以后建立起的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原来不发达的国家,并非马克思当初设想的在“资本主义一切成就的基础上”所有最发达国家同时爆发社会主义革命后建立的那种“社会主义社会”。对了!所有现实中存在过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取得过“资本主义的一切成就”,当然也不是生产高度社会化的社会,它根本没有条件



在全社会用计划直接配置资源。至于未来在资本主义一切成就基础上出现的社会究竟是不是没有商品、没有货币、没有市场的“产品经济形态”，究竟是不是能用计划取代市场来直接配置全社会的资源，这个命题至今与现实生活的距离还很遥远。因此，帕累托的“猜想”依旧是个“猜想”，那就留待遥远的将来再继续“求证”吧！

本书的重点是围绕着上述“猜想与求证”的学术命题来展开的。它的重点不是讲如何建设市场经济体制，也不是探讨当前中国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中的现实问题。鉴于中国改革开放前是一个全民被卷入的高度政治化、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社会，一些关于社会主义的传统观念通过政治学习的方式，从上而下地层层灌输普及，几乎在全民中都深入人心，致使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从高层决策群体到普通的老百姓，每前进一步都涉及观念突破，尤其是高层决策群体的观念突破。为了取得共识，必然要经过反复的观点碰撞、思想解放，经过执政者、决策参与者、学者与广大民众反复的博弈，才能迈出某些关键性的步伐。

本书系统地总结了苏联型经济体制形成的背景、基本特征；也顺便提到典型的东欧国家的状况，尤其是扼要地评论了南斯拉夫自治制度失败的理论根源；追述了中国从1950年以后先是“以苏为师”、照抄照搬苏联模式，后来是尝试“突破”、却走到一个更加荒诞、极端的“左”倾错误指导的历史过程。但笔者着重描述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些重大观念突破的真实过程，其中包括笔者本人的亲历，并穿插一些亲知亲闻的故事。在后记中，还实录了笔者跨越封闭的藩篱，在20世纪80年代走出国门赴美欧实地的观察与思考，因而具有一定的故事性与可读性。本书不是泛泛地讨论意识形态领域的所有争论，那不是我的专业，而是紧紧围绕着计划与市场在现实经济体制抉择进程中相关的争论以及当时的大环境，描述在经济体制转型进程中一些重大决策是怎样经历了反复曲折的博弈后才产生的。这个过程中每一阶段的重大决策都是在参与人员（尤其是高层决策人员）的理念、学者建言、民众呼声反复博弈的策略互动中产生的均衡。书中既有述，也有评，表达了笔者本人的真实认识。这与侧重诠释经典、宣讲文件的写作风格是不同的。

在追述历史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在博弈过程中，往往要有“说了算”的“一言九鼎”的人出来拍板定案，才能达到当时的均衡。在历史上，有不少由某人拍板定案犯重大错误的事例，如斯大林一锤定音地实行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毛泽东一锤定音地“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大办人民公社”、“以阶级斗争为纲”、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等。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作为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具有高度政治智慧的战略家邓小平，他的“一言九鼎”的权威性的正面作用在于，他曾经及时地作出推动社会变革的一些重大决策，不致凡事争论不休、裹足不前、延误时机。比如，他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对肯定“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对农村实行“包产到



户”，对举办观念和体制创新的“经济特区”、对市场化改革“姓社”不“姓资”等问题争论的表态，都起了极其重要的积极作用。邓小平的“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的科学论断，更是不仅推动了中国经济改革进入建设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时代，还开辟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兼容的新纪元。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邓小平也开过好头，比如，“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这一改革举措的制度化的意义就十分重大和深远。但由于种种原因，这方面工作后来的进展还不能满足人民的期盼。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一切重大决策必需事前有充分的调查研究和民主讨论，事后有可检验的问责制度进行监督，要建设起制约公权力的制衡机制，而且要使这些机制和制度法律化。特别在涉及人的基本权利、人的命运前途、对重大历史问题的评价、国家的重大建设项目和发展方向等重大事项时，更不能由某一个人说了算，一定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依法治理，“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

我们还看到，在明确改革目标模式前，改革只能是渐进的，不仅因为实践经验的积累是渐进的，更重要的是因为人们的思想解放过程也是渐进的，对深入人心已久的传统观念的重新认识和突破也是渐进的，同一个人，在对某一个问题的认识上思想是解放的，在对另一个问题的认识上可能思想又不够解放了；此时是这样认识，彼时又是那样认识，认识过程的反复性也是常有的。何况，改革初期，人们已在封闭的环境中生活得很久了，对外界的事物知之甚少，当时，改革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而在开放了30多年以后，当今的中国，仅出国出境旅游的老百姓就达8000多万人次，加上公派和自费留学生及访问学者、出国出境公务或商务人员及其探亲的家属，总计出国人数要以亿计了。再加上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与普及，众多的中国人已不再生活在封闭环境里，人们对外部世界的现代社会了解得越来越多了。关于改革发展大计，已经完全有条件经过专家、干部、群众、网民的反复讨论，综合作出所谓的“顶层设计”，坚持走与市场经济兼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整体地建设好民主法治、文明富强的现代化国家，实现社会和谐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 (二)

从我个人来说，这本书是我60多年经济学生涯的总体反思和心得。

我1951年入大学经济系。在复旦大学本科三年级的时候，对学生的培养目标划分为“理论”与“计划”两个专业，我选择的是理论专业，重点是学习社会主义经济理论。1956年，本科毕业时，正好国家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而且准备实行“学位制”，我被选为在上海市授予学位的“试点”，通过了答辩，答辩委员会主任是老经济学家沈志远先生。但不久国家就改变了决策，不实行学位制，我也就没有获

得学位。毕业后,被留在复旦大学从事教学工作6年。从学习到工作期间,经历了“三反五反”、思想改造、反右派、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反右倾等政治运动,曾带领学生下工厂、农村搞调查,也上讲台教过政治经济学、人民公社经济、经典著作选读等课程。

1962年秋,恰逢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老经济学家黄松龄组建社会主义经济研究中心,要招几名学位制研究生,我报考并被录取了。此后,又攻读了4年“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专业的研究生,全部时间和精力都用于读经济学经典原著,主要是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也有《经济学说史》这门课,由老师介绍西方从古典经济学大师亚当·斯密、李嘉图的著作到当代凯恩斯主义及其他各流派的代表作。入学初期,研究生科长向我们宣布:毕业时将授予学位,相当于西方国家的博士或苏联的副博士。但从1964年社会科学学部会议开始,意识形态领域“左”的倾向重又占据主导地位,视学位制为“培养修正主义精神贵族”,国家决定对大学生和研究生一律不授予学位,相反,要求他们通过下乡和下厂参加体力劳动,接受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再教育,思想感情上“和普通劳动者划等号”。所以,我虽然读过9年经济学专业,却没有获得过任何学位。这是那个时代国家的制度决定的。

此后,我按照组织安排,研究过苏联经济、南斯拉夫和东欧经济,参加过新华社等单位牵头组织的国际经济研究课题,如1975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等,还参加过人民出版社从全国借调人员组成的内部编书班子,编写过苏联1953年以后的经济实况资料。

粉碎“四人帮”不久,1977年春,我从北京大学被借调到中央宣传口做拨乱反正的调研工作。这项工作使我有机会亲历了当代中国拉开改革开放帷幕和逐步解放思想、突破传统观念的历程。

1979年12月,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获得副研究员的高级职称。1980年1—12月,被借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研究室做大规模经济调研工作。1984年10月—1986年底,被中国社会科学院派往美国的伊利诺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华盛顿威尔逊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访问研究两年多。在那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在美国东、中、西部及欧洲14个国家作了实地考察。这是我自己思想进一步解放的过程,也是我对中国发展道路深入思考和重新认识的过程。我在寻思中国发展道路的时候,集中到一点,就是思考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关系。我着重考察现代市场经济的实际状况究竟如何?它是不是任何国家经济繁荣发达的必由之路?发达国家如何从自由市场经济转型为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国家究竟要不要和能不能搞市场经济?等等。

1986年底回国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被评为“研究员”。当时,我试图和我正在指导的硕士研究生张宇燕一起,致力于建设中国自己的《比较经济体制学》这一

新学科。我们合作撰写了《比较经济体制学概览》和《关于比较经济体制学的若干问题》两篇文章,概述了这一学科在西方如何兴起发展的脉络及主要代表人物的主要观点,刊载在国内的学术期刊上。当我们着手要写专著的时候,我感到很困难。因为“比较”的目的是“择优”,是要为中国优选经济体制服务。但是意识形态“左”的干扰仍然不断,很难展开深入的理论探讨。中国改革的实践还处于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中,经济体制没有定型。我想,也许投身实践更能干点实事,比闭门静思更能发挥“滴水”的作用。

恰巧,在我出国前,国务院新成立了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这个专门设计、规划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机构。洪禹(“文革”前任中宣部理论局长)曾多次给我来电话,还约我去面谈一次,他说,奉童大林(“文革”前任中宣部秘书长,此时被任命为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之命来找我,欢迎我能转到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去工作,说我对国外经济体制的比较研究十分有助于思考中国今后的经济体制改革。童大林和洪禹都是在1979年中共中央召开的理论务虚会认识我的,他们对我在务虚会上一次关于世界经济体制比较的即兴发言有较深的印象。对此,我表示衷心感谢。但是,我告诉洪禹,我有机会马上去美国访问研究两年,我不想放弃这个机会,只好等出国回来再议。回国后,我感到学究式地钻研概念和孤立地介绍外国学术成果对中国的实践影响甚微。于是,想到了出国前的约定,愿意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做些对中国改革直接产生影响的实际工作。1988年6月,我被正式调到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国外经济体制司担任副司长,专门负责国外经济体制的比较研究工作。

调体改委前,我写了一本《比较经济体制学》专著,但由于种种原因,出版的时间拖延了几年。而且在开印前恰逢苏联发生了“8·19”事件,为回避政治与外交风险,出版社临时决定抽下了其中6.5万字关于苏联模式研究的内容。这对该书的质量(特别是现实针对性)有一定的影响。

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工作期间,我一方面应对眼前的实际工作,另一方面,内心的思考没有停止。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萦绕在我的脑海,挥之不去。我把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的研究思考看作是求解经济学领域里的哥德巴赫猜想,并曾以此为题,给《人民日报》内参写过一篇文章。由于在思想上已经酝酿了很久,终于在1990年,当中国市场化改革方向面临前进还是倒退的紧急关头,体改委领导给了我一个向上建言献策的机会,我写的一份内部报告被作为“绝密件”上报,获得了当时的中央领导人首肯,报告的观点与日后邓小平南巡讲话的精神一致,对破除“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理论误解,推动中国市场化改革继续前进和明确选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起了适时的积极促进作用。

现在,我退休已经十多年了,但研究工作和思考没有停止。自2003—2005年,应陈锦华(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曾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主任)约请,在他的组织、策划和指导下,集体撰写并出版了68万字的合著《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兼容》一书。

眼前奉献给读者的这本《猜想与求证》,是我酝酿很久的想法。从什么角度、用什么方法能彻底解决“姓社姓资”的争论?用什么表述能使人们从思想理论上正确地既坚持远大理想而又不致干扰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的实际工作?怎样才能从根本上摆脱“左”倾思想理论的影响?我不知道这本书能不能达到我预期的这些目的。但这却是我毕生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总体反思和主要心得。这本书,我曾多次提笔,又多次撂下,原因是对它的效果没有把握。2013年春,复旦大学洪远朋教授约我给母校“泛海书院”奉献一册,重又激起我提笔的热望,我就下决心把它写出来。这本书主要是围绕着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源配置方式的百年艰辛探索,写出自己在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征途中的心声。讲的都是我本人所读、所见、所闻、所为、所想的真实。我希望这本书有一定的可读性,能使读者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从传统步入现代的这个大时代的历史进程中找到一些对现实和未来都可以借鉴、启迪和警示的东西。果能如此,本书就完成了它的使命了。

江春泽

2013年秋于北京

---

*Contents*

## 前言

**第一篇 猜想的提出**

——帕累托与马克思

- 第1章 帕累托“猜想”的提出和西方学术界的论战 / 3
- 第2章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大工厂”的设想 / 8
- 第3章 关于在未来社会“商品生产将被消除”的预见 / 10
- 第4章 关于在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爆发社会主义革命的预见 / 12

**第二篇 列宁在实践中多次修正认识、变动体制**

——总趋势是从计划退让,向市场靠近

- 第5章 建成一个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  
——列宁最初的设想 / 19
- 第6章 通过“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建设社会主义  
——从现实出发,列宁作了第一次修正 / 22
- 第7章 建立“战时共产主义的动员令体制”  
——迫于战争形势,列宁作了第二次修正 / 25
- 第8章 实行有市场因素的“新经济政策”  
——为摆脱经济困境,列宁作了第三次修正 / 31

第9章 强调“必须从市场的存在出发并考虑市场的规律”

——对根本道路有新的认识,列宁作了第四次修正 / 37

第10章 提出经济全面市场化设想

——在晚年著作《论合作社》中第五次修正认识 / 41

本篇小结与评论:列宁是从实际出发、与时俱进地对待市场关系,但没有放弃消灭商品、货币与市场的目标 / 44

### 第三篇 斯大林的答案:强力推行中央计划经济体制

第11章 列宁逝世后联共(布)内部的激烈斗争 / 49

第12章 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在苏联的形成及其基本特征 / 66

第13章 简评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 69

本篇小结与评论:历史抉择的偶然因素与必然逻辑 / 72

### 第四篇 毛泽东:从提出新民主主义到 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第14章 新民主主义经济构想与实践效果 / 80

第15章 毛泽东领导“跑步进入”社会主义 / 89

第16章 从“以苏为师”到尝试突破 / 103

第17章 在“左”的指导思想下进行建设和变革生产关系 / 117

第18章 中苏“十年论战”是“文化大革命”的舆论准备 / 129

第19章 “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动“文化大革命” / 133

本篇小结与评论:对1978年底前二十多年经济体制变动的述评 / 138

### 第五篇 邓小平:从拉开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 帷幕到破解计划与市场的世纪难题

第20章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新时期和新道路 / 144

第21章 中国经济领域市场化改革的突破口

——农民率先扮演市场主体的角色 / 161

- 第 22 章 观念创新与体制创新的试验场  
——“经济特区” / 173
- 第 23 章 国企改革是怎么起步的? / 185
- 第 24 章 1984 年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改革开放又一个里程碑 / 192
- 第 25 章 1990 年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一份  
重要报告 / 214
- 第 26 章 邓小平破解了世纪难题,大大推进了改革的进程 / 224
- 本篇小结与评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探索中的基本经验 / 233
- 后记:跨越封闭藩篱的实地考察 / 243
- (一) 当有机会走出国门的时候 / 243
- (二) 20 世纪 80 年代赴美国实地观察与思考散记 / 247
- (三) “欧罗派斯”联想与欧洲典型国家一瞥 / 262



# 第一篇 猜想的提出

——帕累托与马克思

